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历史、理论与世界意义*

罗建波

内容提要 当下国内外关注的中国治国理政经验，主要是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逐步探索和积累的改革、发展与治理经验。中国治国理政经验具有四方面的显著内涵：自立精神、发展主义、有效政府、多元共识。随着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发展的普遍关注及中国自信的增长，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交流、观念互动和治理对话正在稳步发展，成为当前南南合作深入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和生长点，具有全球发展和全球治理层面的意义。其深入发展不仅有助于推动全球发展问题的解决，为发展中国家探索自主发展道路提供新的启示，也能通过不断深化的南南知识交流和观念创新助推全球知识流动格局趋向多元化发展，进而为世界秩序的发展和完善带来积极影响。继续推进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的行稳致远，需要坚持相互平等、互学互鉴、存异求同的原则。

关键词 中国外交 发展中国家 治国理政经验 南南合作 国际秩序

作者简介 罗建波，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中国外交研究所所长、教授（北京 100091）。

当今世界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和大调整时期，全球性的观念、制度和文化的合作与交流更加紧密，竞争与交锋也更加激烈。其中最富积极意义的方面，是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交流、观念互动和治理对话正在稳步发展，成为当前南南合作深入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和生长点。此种经验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秉持正确义利观深化与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研究”（18BGJ021）的阶段性成果。

交流在本质上属于人文交流的范畴，也具有全球发展和全球治理层面的意义，其深入发展不仅有助于培育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相互理解和政治互信，也可以通过经验、观念和制度层面的对话助推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发展，帮助它们更好地应对和解决全球性发展和治理问题。放眼未来发展趋向，在人类知识延续几个世纪由北方向南方流动和扩散之后，全球性知识流动格局正在趋向多元化发展，这些曾经在世界体系中长期处于边缘的发展中国家开始通过横向合作推动知识与观念创新，进而彰显它们对人类发展的新价值和贡献。在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治国理政交流的发展历程基础之上，如何进一步凝练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的理论内涵，不断探索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的发展之道，就显得十分必要也十分重要。

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的历史演进

经验交流一直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南南合作的重要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合作从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时期的政治团结与互助，逐步过渡到经济建设和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全方位互利合作，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交流也从最初以革命经验交流为主，逐步拓展提升为改革与发展经验的分享，以及更为全面意义上的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南南合作历史任务的转变以及国际环境的巨大变迁，赋予不同时期经验交流以不同的内容与形式，也因此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烙印。

早在20世纪50~70年代，年轻的中国怀揣共产主义的世界情怀，也着眼为自身维护主权独立并打破外部封锁争取更多的政治支援，曾广泛声援和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在这一时期，许多亚非拉国家友好人士纷纷前往中国，寻求实现国家独立的精神激励和斗争经验。第三世界的大团结极大地推动了亚非拉世界的民族独立运动，摧毁了西方殖民大国建立和维系的长达百余年的殖民体系，中国在这一斗争中也极大地彰显了自身的力量和价值，有力塑造了中国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认同与互信，奠定了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友好合作的政治和情感基础，其历史意义至今仍在显现。赞比亚原总统卡翁达曾这样称赞道：“中国是南部非洲同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进行斗争的爱国力量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中

国对莫桑比克、安哥拉和津巴布韦人民的支持对这些国家的解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①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性接触，从一开始就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战略重心逐步转向经济建设，亚非拉世界民族独立运动也基本完成，南南合作的历史任务悄然发生重大转变。如果说此前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经验交流主要是革命经验的横向传递，那么进入80年代后则演变为发展经验的横向交流。20世纪80~90年代，中国领导人在会见发展中国家代表时，一个重要内容是向外宾介绍中国改革和发展经验，鼓励他们探索适合自身条件的发展道路。1985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时谈到，“我们的经济改革，概括一点说，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他自信地展望：“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实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②

表1 中非合作论坛会议拟定的非洲人力资源培训计划

中非合作论坛会议	培训起止时间（年）	计划培训非洲学员（人次）
中非合作论坛第一届部长级会议（2000）	2001~2003	7 000
中非合作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2003）	2004~2006	10 000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暨第三届部长级会议（2006）	2007~2009	15 000
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2009）	2010~2012	20 000
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2012）	2013~2015	30 000
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2015）	2016~2018	40 000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2018）	2019~2021	50 000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外交部中非合作论坛网站（<https://www.focac.org/chn>）资料整理。

^① 谢益显：《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96页。

^② 邓小平：《对中国改革的两种评价》（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一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页。

进入 21 世纪,中国开始逐步显现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国际影响力得到快速提升,中国也更加自信地向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介绍中国发展的成就与经验。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历八九十年代的政治动荡和经济停滞,也开始更加重视对中国政治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注,非洲国家“向东看”、部分拉美国家“向西看”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2000 年首届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的召开,开创性地设立“非洲人力资源开发基金”,推动了中非人力资源开发合作的大规模快速发展(表 1)。2006 年 1 月,中国政府发表首份对外政策白皮书——《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把“相互学习、共谋发展”确定为中国对非洲政策的四项原则与目标之一,明确提出中非双方“相互学习借鉴治国理政和发展的经验……支持非洲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共同探索可持续发展之路。”^① 治国理政经验开始作为一个独立词汇被明确提了出来。

从字面意义上讲,虽然经验交流本身也涉及国家发展的方方面面,但治国理政经验在囊括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的同时,也更加明确地涵盖了诸如道路选择、制度建设、治理建设、政党建设等更为宽泛的内容。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九大以来,中国开始更加自信地思考自己的道路、理论和制度选择,更加系统地总结提炼国家发展和治理的经验、教训和相关启示,也开始更加深入地推进中国与世界特别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治国理政经验交流。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明确把“能力建设”作为未来三年中非合作的“八大行动”之一,表明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和国家能力建设已经成为中非合作的优先合作领域之一。中拉合作论坛也把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作为深化中拉合作的重要事项,中拉双方决定共同建设陆洋一体的大联通、培育开放互利的大市场、打造自主先进的大产业、抓住创新增长的大机遇、开展平等互信的大交流“五位一体”合作大格局。^② 在此背景下,治国理政经验的交流涵盖面愈加广泛,从非洲和部分亚洲国家逐步拓展到囊括拉美、中东欧和南太平洋岛国等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交流内容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经验逐步拓展到更为广泛、深层次的国家发展和治理领域,交流形式从党政高层交流逐步拓展到包括公共外交、民间和智库交流在内的大外交格局,交流对象也从党政官员和专家学者逐步拓展到包括传媒、非政府组织、妇女和青年领袖等各层面各

^① 《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载《人民日报》2006 年 1 月 13 日。

^② 习近平:《携手共命运 同心促发展》,载《人民日报》2018 年 9 月 4 日。

领域的精英人士。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已经成为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个重要亮点。

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的理论内涵

一般意义上，时下国内外热议的中国治国理政经验主要是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逐步探索和积累的改革、发展与治理经验。人们试图回答，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超大型发展中国家，何以能够实现近 40 年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快速发展，其背后的“秘密”究竟何在？中国经验对世界意味着什么，特别是对多数尚未实现经济社会较快发展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究竟有何种启示和借鉴意义？

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界定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的本质。从宏观看，中国过去 40 年的发展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主动追求现代化并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历程。着眼中国自身历史演进，这一进程是中国近代以来追求国家独立、发展和富强的最新努力，是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这一宏大社会变迁的最新阶段。^① 放眼全球，中国发展是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在实现民族独立后追求发展和复兴的一个重要实践，是当今世界解决全球发展问题的一个突破性进展，也是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结构呈现全球性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重要推动力量。由此，中国的发展就不仅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全体中国人的世纪夙愿，其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治国理政经验所带来的某种启示也关乎着整个发展中世界的发展，而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新兴大国对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深度参与还关乎着世界共同的命运与前途。中国经验的积累和对外交流，才因此具有了超越中国自身的更为广泛的世界意义。

对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的总结和提炼，也因此具有两个指向，既要呈现中国的创新因而彰显中国个性、中国特色，又要能够进行世界表达因而能为世界所理解，推动世界读懂中国，进而通过经验交流互鉴助推世界减贫与发展进程以及发展中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由此更好体现中国经验的世界价值和意义。具体来讲，这种经验总结就不应只是强调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某些显著中国特色，而更应从一般意义上国家构建（State - building）的理论与实践

^① 罗荣渠先生曾明确主张从现代化的视角来叙述中国的近现代史，来认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商务印书馆，2004 年版，第 487 ~ 511 页。

角度去思考中国治理经验的世界价值,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追求发展并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的普遍性问题挑战的角度去总结中国经验的普遍性意义。在此,本文尝试提出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的四方面显著内涵:

(一) 自立精神

中国发展模式的最根本之处,在于对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深刻理解与一贯坚持。中国从开国领袖毛泽东开始,就始终强调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强调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和智慧来实现国家发展,并由此彰显中国人的价值和意义。^①在中国人看来,独立自主不仅要在政治上获得独立,更要实现思想和精神上的自立自强和完全解放。其实质,就是要自主决定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和制度选择,自主决定自己民族、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在中国人看来,独立自主不只是每个民族国家自己的事业,整个第三世界的南南合作也是更为广泛意义上自立自强和自力更生的一部分。这一南南合作精神,得益于早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时期建立统一战线的历史启示,成长于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时期南南合作的现实需要,在今天发展中国家追求发展和复兴进程中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对现代化的追求及战略选择,很好展现了中国的自立精神。在探索发展道路时,中国注重学习国外的成功经验,注重借鉴西方经济发展理念的合理成分,但始终强调基于自身国情基础上进行理性选择和借鉴,由此不断完善国家制度设计和发展战略选择。在选择改革路径之时,中国从一开始便选择了一条渐进改革之路,也即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充分保证国家政治稳定的前提下稳步推进改革进程并扩大对外开放领域,在制度不断完善和经济不断发展进程中增强了抵御内外风险的能力和参与世界经济竞争的经验,从而较好地处理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相互关系,因而得以成功避免东欧转轨国家和非洲国家曾经在进行激进政治变革时所带来的不同程度的政治动荡。在追求经济发展之时,中国也曾大量利用外来援助,积极吸引外来投资、技术和管理经验,但始终强调挖掘国内市场潜力、培育自身发展活力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在探寻国际合作之时,中国在注重协调与发达国家的竞争合作

^① 毛泽东曾在1958年国家处于困难时明确强调,中国的建设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这就是我们的路线。”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研究室、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18页。

之时，也自始注重开展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当前中国积极倡导和践行对发展中国家的正确义利观，稳步推进与发展中国家的“一带一路”建设，正在构筑一条横贯亚非拉的更为广泛的新丝绸之路。

（二）发展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具有三方面显著特点：一是将经济发展置于优先地位，即经济发展在相当长时期里是国家追求的中心目标，且全民有着实现现代化的普遍共识；二是政府对经济的有效推动，即政府有着推动经济发展的强烈意愿并拥有有效动员、协调和整合资源以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能力，特别是通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来改善发展条件并提升发展能力，通过有选择性的产业培育以实现在特定领域的追赶型发展；三是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即充分发挥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以承接全球产业转移，主动建立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系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中国经济发展具有许多东亚“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显著特点，同时又试图在政府与政党、社会与国家、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以及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探索更加平衡的关系，不断探索建立现代治理体系并实现治理能力重塑，以超越传统东亚“发展型国家”的某些局限。

中国在经济上的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除了体现在对发展目标的执着追求和发展战略的通盘设计之外，还体现在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种“发展导向”的问题解决路径。中国坚信“发展才是硬道理”^①，试图通过更高质量的发展来解决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通过更为深入的改革来破解发展中出现的难题。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特别是在初期往往涉及复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变迁，必然要触及诸多既有的利益，必然要突破许多既有的制度藩篱，因而容易引发甚至激化各种潜在的问题和矛盾，这就需要政府通过不断增加新的发展机遇、新的发展成就，来满足民众不断提升的发展需求；通过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不断增强，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升社会保障能力，由此持续提高民众的获得感和对国家的认同。正如冷战结束后非洲政治民主化及阿拉伯剧变所展现的那样，面对不断累积的社会矛盾，如果不以更大程度的发展和改革来寻求突破，而是仅仅以“民主”为导向，试图通过一揽子

^①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

的政治变革来解决各种利益矛盾或社会问题，反而可能诱发原本存在的各种利益分歧和认同差异，进而导致各族群、政党和利益集团深陷政治纠纷，而无暇顾及国家发展，其结果可能恰恰适得其反。

（三）有效政府

国内一些学者习惯于用“强政府”来指称中国政府模式，认为这是中国模式的一个显著优势和特色。其实，无论是“大政府”还是“强政府”，都有可能带来国家对社会和民权的压制，在政治学领域都并非是完全意义的褒义词，前者意味着政府规模过于庞大或者涉足的领域过于宽泛，后者则暗示国家权力可能过于集中或过于强势，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与威权主义画上了等号。从改革方向看，中国的国家治理应是一种“有效国家”（Effective State）或“有效政府”（Effective Government），即国家或政府在有限的治理范围和必要的制度约束下行使富有效能的国家权力，比如，维护国家稳定和基本社会秩序，为民众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以及为经济发展提供必要条件和制度激励。^① 何为国家治理能力？任何现代国家，无论其奉行的意识形态和具体的政治体制有何差异，都应该具备推动经济发展、履行公共管理、维护社会基本稳定并为民众提供应有公共产品的能力。它们履行这些职能的程度大致反映了其国家能力的高低强弱，国家也因此可以分为有效的（有能力的）政府、低效的（低能的）政府、失败的（无能的）政府。^②

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之所以相对较强且治理较为有效，至少源于三大因素：一是中国有一套系统且较为成熟的国家基本制度，诸如现代的金融与财政制度、统一的国内市场秩序和经济规则、成熟的法治和治理体系，以及较完备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这是任何现代国家履行其基本职能的必要条件。中国是一个在制度建设方面历史悠久的国家，在现代化开启之前就已经有着逾千年的国家制度经验，在全面推进改革开放之后，又能随着发展

^① 罗建波：《非洲国家的治理难题与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载《西亚非洲》2015年第3期，第74~97页。

^② 王绍光、胡鞍钢等人认为，国家职能与相应的能力包含八个基本方面：维护国家安全与公共秩序的能力（强制能力）；动员与调度社会资源的能力（汲取能力）；培育与巩固国家认同和社会核心价值的的能力（濡化能力）；维护经济与社会生活秩序的能力（监管能力）；确保国家机构内部的控制、监督与协调的能力（统领能力）；维护社会分配正义的能力（再分配能力）；将民众参与需求纳入制度化管道的能力（吸纳能力）；协调不同利益、形成公共政策的能力（整合能力）。参见王绍光、胡鞍钢、周建明：《第二代改革战略：积极推进国家制度建设》，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第90~95页。

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国家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治转型和制度建设的相辅相成且相互促进。由此，中国才有较强的治理能力以全面推进改革和开放进程，才有相应制度设计以有效化解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利益分歧，从而有效维护政治的基本稳定。对于身处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政治发展的主题不仅仅只是政治民主化，也包括同样重要的制度建设和政治稳定问题，后者对于国家的发展和稳定同样具有基础性、决定性的作用。国家首先应该是一个“制度供给者”，进而才能成为政治改革的“推动者”、经济发展的“服务者”和社会秩序稳定的“维护者”。

二是中国政府具有超越国内不同利益集团和政治力量的相对“自主性”（Autonomy），因而能够制定相对长远的国家发展目标，且能够在实践中一以贯之地追求。其实，中国的政策制定环境并非真空，政策制定过程也受到许多来自不同行业和地方的利益集团的影响，但相对于其他多数发展中国家，中国执政党和政府仍然拥有相对更为广泛的代表性，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将长远的国家利益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北京大学姚洋教授因此把中国政府概括为“中性政府”（Disinterested Government），认为中性政府和社会平等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①

三是中国政治崇尚选贤与能，逐步建立了一套较成体系的官员选拔和考核制度，旨在遴选出具有良好知识素养、管理能力而又符合道德标准的行政官员。加拿大著名政治学者贝淡宁（Daniel A. Bell）把中国政治模式称为“贤能政治”（Meritocracy），认为它更加适合挑选出拥有高超能力和美德的政治领袖，同时通过“基层民主、中间试验和高层赏贤”的政治架构尽可能地回应了民众的民主诉求。^②虽然这种制度在具体运作中并非完美，在理论建构上还需更具说服力的解释，但这种政治尚贤有着千年科举取士的历史文化传承，也有数十年的现代政治实践，还有精英和大众对这种制度安排的基本认可，因而体现出某种程度的政治合法性。

（四）多元共识

这里所言多元共识，既体现为中国社会广泛存在的多元共识理念，也体现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广泛存在的多元共识的制度安排。这种多元共识

^① 姚洋：《中国经济成就的根源与前景》，载《文化纵横》2010年第4期，第16~23页；贺大兴、姚洋：《社会平等、中性政府与中国经济增长》，载《经济研究》2011年第1期，第4~17页。

^② [加拿大]贝淡宁：《贤能政治》，吴万伟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第136~163页。

理念，源于中国自古以来的中庸思想与“和而不同”理念，源于中国漫长历史进程中的“大一统”政治传统，在当代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中又不断地得以丰富和发展。这种多元共识制度，具体体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民众自治制度等制度安排，也体现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以及更为广泛意义上的治理现代化进程之中。一些中国学者认为，如果把民主制度大致分为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那么中国的政治制度安排更接近于协商民主的实质^①；如果把民主制度分为多数民主和共识民主，那么中国的政治制度更接近于共识民主。^②与选举民主或多数民主单纯倚重多数票决的方式有所不同，协商民主或多数民主在承认选举合理性的同时，也旨在通过适当的制度设计和包容的政治文化最大限度地吸纳各党派、各阶层、各领域的民众参与公共决策和政治生活，其目的在于通过对话、讨论、审议等方式尽可能地反映大多数人的意见，当然也包括少数人的意见。

在本质上，多元共识是多元和共识的辩证统一。多元共识的前提是多元，社会存在多样性和差异性，谋求共识才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性；多元共识的导向是共识，通过广泛的讨论、对话和协商来化解分歧、增进互信。无论从决策过程还是价值取向的角度，多元共识都体现出明显的多样性、包容性和互利性。因此，共识不是同一，也并非消灭差异，而是基于多元基础达成大体一致，基于差异基础上实现各方的大致趋同，其实质是通过“存小异求大同”以达到最大程度的“和而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与外部世界在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态上存在显著不同，中国与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上也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对外宣介中国多元共识的制度安排时应以增进外部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和理解为主，做好增信释疑的工作。但中国文化、政治和社会体现出的显著的多元共识理念，其丰富的内容值得认真总结与提炼，也值得与那些同样具有多元文化和民族结构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相互交流和探讨。多元共识的主要启示在于，对

^① 林尚立：《中国政党制度与国家建设》，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年第9期，第1~6页；苏长河：《中国模式与世界秩序》，载《外交评论》2009年第4期，第21~31页。

^② 杨光斌：《中国的政策过程追求的是一种共识民主》，载《北京日报·理论周刊》2018年3月5日，虞崇胜、孙龙桦：《共识民主：中国式民主的有效实现形式与发展向度》，载《学习与实践》2011年第1期，第52~59页。

于开启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制度内嵌的“合作”和“协商”精神有助于弥合社会快速多元背景下出现的利益分歧和认同差异，有助于形成比较普遍的对于改革和发展的共同认识，因而避免由于利益诉求不同或对发展道路的理解差异而导致现代化进程被频繁打断的现象。

特别是对于一个民族和文化多样且利益和政治身份日益多元的社会，尤其需要培育一种成熟的包容性政治文化，在广泛动员国民的政治热情和政治参与的同时，又能使权力和利益竞争特别是政党间的竞争合作走向理性化，从而预防潜在冲突的爆发或者至少能够减少社会冲突的对抗性。特别是在族群关系和宗教关系高度多元复杂的社会，如同某些非洲国家所展现的那样，仅仅试图通过多数票决的方式有时难以解决重大政治分歧，也难以达成社会稳定和发展所需要的基本共识。尤其是在思考政党的角色和功能之时，我们要看到政党作为维系各种社会力量的纽带，不应只是国内部分族群、地区或利益集团维持和追求其私利的工具，而应尽可能地代表更为广泛的民众的利益，这是政党能为整个国家起到有效整合作用的基础。而现代政党制度，无论其形式和运作程序存在多大的不同，其根本目的都是一致的，即通过党派间的竞争与合作最大程度地培育社会共识、创造国家整合，而非激化社会矛盾、加速社会离散进而导致国家分裂。^①

以上对中国治国理政经验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思考，这里还需强调四点：其一，中国所言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主要是强调一种自立和自主精神，而非孤立和封闭，更不是依附理论主张的与世界体系“脱钩”；恰恰相反，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正是在全面启动对外开放、全面融入现代世界经济体系之后出现的，而且这一进程还将继续全方位地深入推进。

其二，中国经济的发展主义，主要旨在阐释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某种引导作用以及建立更为良性更为均衡的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必要性，而非刻意强调国家对经济的绝对主导或者政府对市场的过多干预。事实上，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发展的成功离不开大规模的市场经济改革，离不开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和发展举措的某种选择性借鉴；而中国改革的理性在于，它在全面培育市场机制的同时，也能注重发挥政府的发展角色且实现政府职能的较快转变，从而有效实现市场与政府角色的大体平衡。

^① 参见林尚立：前引文。

其三，中国国家制度与能力建设及对多元共识的某种赞许，决不意味着否定中国政府不断推进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也不意味着赞同那种认为威权体制是中国发展取得成就的主要原因的论点，更不意味着说明中国政治体制已经完美无缺以致不需要有进一步的改革开放。而欲说明在发展中国家开启现代化进程之时，在这些国家追求现代民主政治的进程中，必须重视更为基础的国家制度与政府能力建设，因而有序推进国家的改革和发展进程；必须注重培育社会共识，因而减少在现代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社会分裂。或许，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经验则在于，它在充分激发社会发展活力的同时，能够成功化解不断增多的社会矛盾，并通过有效的社会管理来维护国家的基本稳定，从而破解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出现的“经济发展-政治动荡”的政治难题。^①

其四，中国改革开放是一个未竟之业，中国治国理政与发展经验还在进一步的发展、完善和调适。政治学思考的两个核心问题，一是提高国家治理的绩效，二是完善对政府的监督和制衡，如何更好地实现二者的有效平衡仍是中国政治必须思考和解决的大问题。中国政府在官方文件中至今仍未公开使用“中国模式”的概念，更没有采纳“北京共识”这一称谓，显示出其应有的谨慎和谦虚态度，也显示出它对自身改革开放仍需不断推进的清醒认识。

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的世界意义

自近代以来的相当长时期里，世界范围的知识流动总体上呈现出从北方
向南方扩散和渗透，如今这一格局正在悄然发生重大转变。发展中国家在继续借鉴发达国家的知识和经验的同时，也开始推进大规模的南南发展合作与知识交流，这在人类历史上尚属首次。此种经验交流可以助推发展中国家重新思考自身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政策，更好地应对发展和治理问题，同时，得益于南南知识交流与共享而不断深入推进的亚非拉复兴浪潮，又正在从结构上有力推动着世界秩序的发展和演变，彰显着发展中世界对人类发展的新贡献和新价值。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因此有着重要

^① 罗建波：《非洲国家的治理难题与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载《西亚非洲》2015年第3期，第74~97页。

的世界意义。

（一）为全球发展问题的解决提供新经验

当今世界的发展问题主要体现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治理问题。^①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对世界减贫与发展的执着追求，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的发展新愿景，以及世人对非洲联盟《2063议程》的积极关注和支持，都体现出国际社会推动解决全球发展问题的努力和决心。人们试图思考并回答，如何才能提高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减贫成效？如何推动它们实现经济有效增长？如何推动它们有效改善民生、实现社会公正并确保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在减贫与发展方面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提前完成了多项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为全球发展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参照。在减贫方面，中国是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共计减少贫困人口8.5亿多人，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②在经济增长方面，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过去4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达9.5%，这一发展成就相比历史上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毫不逊色。中国经济总量早已跃升世界第二，货物贸易稳居世界第一，对外投资已居世界第二。近年来，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中国发展极大改变了自身超过十亿人口的生活面貌和精神面貌，且其巨大的经济规模及其与外部世界的紧密联系又决定了中国发展自始便具有重大的国际影响。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世人开始关注中国的发展及其经验积累，于是中国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撬动减贫与发展的经验，有效激发社会创新活力和创业激情的政策举措，以及中国政府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都成为他们热议的话题。作为对外部世界的一种回应，同时也是中国对自身大国责任的一种不断增加的自信和自觉，中国开始更加主动地向世界介绍中国发展和治理经验，通过更加广泛参与世界发展和治理进程来展现中国对世界发展的新贡献，通过推动全球发展问题的解决来彰显中国发展的世界价值和意义。中国在南南合作框架之下不断打造、

^① 仅以贫困问题为例，根据世界粮食计划署公布的“2018饥饿地图”（Hunger Map 2018），在世界平均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亚非拉地区仍然有8.21亿人处于饥饿状态或者无法获得充足的食物。See WFP, “Hunger Map 2018”, <https://www1.wfp.org/publications/2018-hunger-map>, 2019-02-17.

^②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2018年12月，http://www.gov.cn/xinwen/2018-12/12/content_5347961.htm, 2019-02-17.

整合和提升诸如中国 - 东盟 (10 + 1) 会议、中非合作论坛、中拉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金砖国家组织等新的合作平台, 发起成立了亚投行、金砖新开发银行等新的多边投融资机构, 设立了丝路基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中国 - 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等新的发展倡议, 以及积极推动更为广泛意义上的“一带一路”建设, 以支持和帮助受援国增强自主发展能力、更好实现减贫和发展。特别是中国还发起设立了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以及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 通过稳步加大人力资源培训力度, 广泛邀请发展中国家的各领域各行业专门人才来华参与研修和研讨, 及时分享中国发展经验和实用技术。通过助推发展中国家实现减贫与发展, 进而对全球发展和治理问题的解决做出自己的贡献, 是当今中国展现自身国际责任和大国形象的重要方面。

(二) 为发展中国家探索自主发展道路提供新启示

中国经济至少具有三个层面的内涵和启示意义: 一是技术层面, 即诸如减贫和经济发展的具体经验和专业技能; 二是制度层面, 即国家制度建设治理能力提升; 三是观念层面, 即中国的自主精神以及对发展道路和发展路径的自主选择。在过去很长时期里, 发展中国家要么全面效仿苏联模式, 要么全盘复制美国模式或更大意义上的西方模式, 苏联模式早已证明由于内在的体制缺陷而无法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而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度安排也被实践证明无法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所有发展和治理难题。20 世纪 80 年代曾经风靡非洲的“经济结构调整计划”总体以失败而告终, 冷战结束后受西方国家强力推进的非洲政治民主化进程也一度给非洲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动荡, 而同期广泛影响拉美和东欧转型国家的所谓“华盛顿共识”也并未取得预期成效。一个重要原因在于, 这些外来经验看似完美无缺, 但当它们被人为“移植”到有着极为不同的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时, 往往显得不那么“灵验”或呈现明显的“水土不服”。而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最为根本之处, 就是明确倡导独立自主的精神, 强调基于自身历史文化和现实条件来思考外来的经验及其可借鉴之处, 来思考自身发展道路和路径选择。因此, 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最为重要的东西, 或许是方法论上的启示和精神上的启迪。

中国发展的这种自主精神最为充分地体现在它对发展道路的思考和对发展路径的选择上。中国注重汲取市场经济理论和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合理之处, 但始终强调国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某种宏观调控能力; 中国注重学习西方现

代治理经验，同时又较好地保持了自身制度优势和制度特色，因而得以在不断的制度改革和调试中保持社会稳定，并实现更大程度、更高质量的发展。中国学者习惯于用“渐进改革”来概括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路径，并认为这是中国之所以能够较好实现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相互促进的重要原因。近年来，诸如卢旺达、乌干达、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也在积极探索自身发展道路，在实现国家政治稳定的基础上探索富有自身特色的政治道路，并稳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①一些西方学者也能认识到政治秩序对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意义。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无疑是西式民主的最忠诚的拥护者之一，他在仔细观察和跟踪第三世界的现代化历程之后，也坚定地认为，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政治秩序较之经济发展和民主化更为首要。他提出，在发展中国家开启现代化进程的初始时期，社会改革和经济发展往往不是促进政治稳定，反而成为政治衰败和政治动荡的诱因，成为革命的“催化剂”而非“替代物”。^②亨廷顿的得意门生弗朗西斯·福山更是明确地把国家构建和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置于国家发展首要位置，他在肯定政府权力需要约束的同时，也认为发展中国家必须有选择性地强化或弱化自身的管理权。贫困国家不需要什么都管的，但它们确实需要在有限范围之内具有必要功能的、强有力并且有效的政府。^③“贫穷国家之所以穷，不是因为它们缺少资源，而是因为它们缺少有效的政治制度。”^④

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经济发展较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更快、更好，中国长时期的政治稳定相较也颇为明显，其重要原因似乎不在于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政府职能范围上存在多大差别，而在于中国的国家基本制度更为完

① 近年来埃塞俄比亚积极打造“民主发展型国家”（Democratic Developmental State），其重要初衷就是要借鉴中国和东亚“发展型国家”的经验。Omano Edigheji, *A Democratic Development State in Africa? A Concept Paper*, Centre for Policy Studies,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May 2005, pp. 1 - 9; Muleta Yirga Shumuye, “The Role of Developmental State in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Ethiop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and Asian Studies*, Vol. 14, 2015, pp. 96 - 110.

② [美国] 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页。

③ [美国] 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5页。

④ 福山在骨子里仍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坚称只有实现国家（the state）、法治（the rule of law）和负责任政府（accountable government）三者间的平衡，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才能构成“现代政治的奇迹”。参见 [美国] 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29页。

善、政府治理能力相对更高。^①虽然中国政治制度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政治特色，因而不大可能被其他国家全盘复制或接受，但它的某些政治理念和治理优势仍然值得与其他国家相互分享。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谈到“东亚发展型国家”时，明确批评“华盛顿共识”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那种“一刀切”地假定所有政府都一无是处的观念是“不恰当的”，而应思考的问题是：在何种情况下何种政府干预是积极的，以及为进行有效干预，政府的制度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的意义又何在？^②贝淡宁也认为，中国的政治尚贤制可能只适合越南等少数国家，但它的某些要点也能够给世界带来某种启示，其经验也能为其他国家有选择性地采用。^③如果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能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些新的启示，在它们探寻发展道路、思考发展战略时多一份参考，进而提升它们的国家治理能力，助推其发展和复兴进程，这将是中国发展在惠及自身之时对世界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

（三）为南南合作深入发展提供新助力

北京大学李安山教授曾指出，文明互鉴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不同文化的相通性，二是不同文化的互补性。^④中国与部分周边国家甚或更为遥远的非洲国家，在集体主义、平等待人、多元包容等方面有着相似的认同和取向，在国家观念、社会秩序和制度建设等方面也有一些相近的理解和认知，这种文化相通性是各方增进政治互信和情感认同的重要基础。同时，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观念、制度和发展战略上又各有特色，且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绩效，因此各方完全可以相互分享、借鉴彼此的积极方面，由此不断提升现代政治理念和国家治理能力。当前，中国致力于推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是要不断拓展提升南南合作的内涵和层次，通过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互信、安全共筑、经济共荣、文明互鉴来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与繁荣。中国明确提出要打造中非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和中拉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把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关系以及更大程度的南南合作打造成推动构建人类命

^① 罗建波：《非洲国家的治理难题与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载《西亚非洲》2015年第3期，第74~97页。

^② 斯蒂格利茨指出，在促进穷国发展方面，“共识根本不存在，除了华盛顿共识没有给出答案。”[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后华盛顿共识的共识》，载黄平、崔之元：《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6~102页。

^③ [加拿大]贝淡宁：前引书，第164~178页。

^④ 李安山：《释“文明互鉴”》，载《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69~75页。

运共同体的典范和样板，把它们视为通向更大范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要阶段。

回顾历史，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南南合作，从 20 世纪 50 ~ 70 年代共同反帝反殖反霸，到 20 世纪 80 年代后共同追求经济发展，当前更是迈向合作内涵显著拓展、合作层次快速提升、合作影响不断增大的新阶段。如果说 21 世纪以来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关系正在全面升级，那么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则是这种转型升级的重要体现。这种经验交流，是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追求现代化进程中对各自发展模式、理念认知与经验探索的相互分享，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合作从一般意义上的经贸往来发展到更深层次的理念对话和知识共享的重要举措，也是发展中世界内部不同民族、文化和文明间的交流与互鉴。这种经验交流，无疑有助于增进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对彼此的认识和理解，通过互信的增进来夯实彼此间的情感纽带和民众基础，通过观念、文化和思想的交流来逐步培育中国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共享价值”。此种“共享价值”的培育，必将能为新时代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关系奠定更加坚实的价值观基础，为世界发展贡献更多来自非西方世界的思想与智慧。

（四）为世界秩序的发展和完善提供新愿景

自人类步入近代以来，延续几个世纪的世界秩序虽然几经调整与演变，但世界秩序在总体上由欧美大国所主导的事实至今未有根本改变。在欧美列强眼里，近代以来的世界文明和财富由欧洲以及后来更大范围的西方世界向非西方世界扩散，“文明的”西方自然有权来为世界塑造规则，“发达的”西方自然有所谓的高尚“责任”来拯救世界。从 18 世纪德意志哥丁根学派史学家首先提出“西欧是世界历史的中心”，到 19 世纪史学家兰克（L. V. Ranke）以拉丁与日耳曼各民族为主题来编撰所谓的《世界史》，再到 20 世纪上半叶卡尔顿·海斯（C. J. Hayes）等人以“白种人的负担”来描述近代欧洲文明向世界的传播以及欧洲白种人对千百万黑色、棕色和黄种人的“教导”，都体现了近代以来西方在世界的支配地位以及它们以一种不平等姿态来处理与亚非民族的关系。^① 出于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某种反思，英国学者杰克·古迪（Jack Goody）在其大作《偷窃历史》中感叹历史被西方所接管（take-over），即西方人先是以西方事件为中心把西洋史当成世界史，继之以西方视角为中心把

^① 海斯等人称，“从伯利克里和凯撒的时代直到现在，历史上伟大戏剧中的主角，都是由欧洲白种人担任的。”参见 [美国] 海斯、穆恩、韦兰：《世界史》，中央民族学院研究室译，三联书店，1975 年版，第 1 059 ~ 1 060 页。

世界史写成西洋史。^① 在西方强势文明的主导下，世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西方是现代世界体系的缔造者，因而享受着统治世界、引领世界的天赋权利。但如果换一个视角，如果从广大第三世界的角度来看，这些在历史上曾经创造过辉煌文明但在近代以来备受压迫和屈辱的国家，通过长达百余年的民族抗争和南南合作，逐步实现了政治独立，并在此基础上开始追求经济发展和更为全面意义上的民族复兴。第三世界由自立和自主逐步走向自信和自强，不仅改变着自身，也正在改变世界。

的确，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在经济上的快速发展，伴随着南南人文合作与知识交流的广泛开展，人类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知识流向日益呈现更加多元的格局，这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变化之一。以发展中国家政治互信、经济互利、文化互鉴为核心内容的横向合作正在全面展开，世界日益呈现出一种“多中心化”甚或“去中心化”的趋势。以一种“大历史”的视野观之，延续几个世纪之久的以西方为中心、以亚非拉为外围的“中心—边缘”垂直体系正在悄然发生重大转变。这些在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长期处于边缘的地区和国家，如今通过自主发展和横向联合，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成为国际政治舞台的重要参与方，成为人类知识的重要创造者。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世界财富、权力、观念以及国际话语权都在发生某种具有历史意义的结构性改变。^②

余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需要坚持的几点原则

21世纪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来，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得到快速发展，相关经验分享、知识交流和制度对话正在全面展开，交流形式和平台正在不断创新，合作成效和国际影响也在逐步增大。继续全面、深入、审慎推进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我们要始终秉持谦虚谨慎的精神，坚持以下原则：

第一，相互平等。几十年来，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友谊之所以能够经历不同时代而愈久弥坚，根本在于双方能够始终坚持相互平等和相互尊

^① Jack Goody, *The Theft of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6, pp. 1-9; 钱镇：《历史原来可以这样写》，载《中国投资》2018年第2期，第90~92页。

^② 罗建波：《亚非复兴进程与世界地缘政治转变》，载《西亚非洲》2009年第5期，第12~17页。

重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实现互信、互助、互利、互鉴。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也自然应该尊重对方的平等地位，尊重它们的自主选择，尊重它们的本土知识，在经验、知识、文化层面上建构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中国政府强调，中国在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时严格做到三个“不”，即中国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也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① 西方国家的相关实践早已告诉我们，以一种“救世主”式的自负情结来审视第三世界的发展，以一种“教师爷”式的傲慢姿态为发展中国家开“药方”，事实证明难以实现预期目标，也难以为发展中国家所接受。

第二，互学互鉴。中国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国家。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治国理政经验交流还要坚持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而非中国经验的简单复制或单方面介绍。从中国自身角度看，中国经验尚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之中，因此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政治转型、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等方面的探索和思考可以为中国提供相关经验，即便是它们走过的弯路和积累的相关教训也可以为中国的制度建设提供某些启示，让中国更好也更加从容地规划自身发展方向和道路选择。从其他发展中国家角度看，它们确实也有着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比如许多非洲国家对市民社会的适度培育，对自然环境的充分尊重，对多元文化的高度包容，都值得中方认真研究和体会。

第三，存异求同。我们自然希望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观念和制度层面展开更多的交流，培育更多的互信和相互认同，甚至建立某种程度的“共享价值”，从而为人类文明的繁荣进步贡献更多发展中国家的智慧，为世界秩序的演进贡献更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方案和力量，但从目前阶段看，这仍然属于理想的愿景而非普遍的客观现实。我们要看到，中国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文化有着很大的不同，经济与社会发展程度有显著的差异，政党政治制度也有各自的特色，因此双方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应当在尊重多元和差异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予以推进。最容易入手的是相互分享减贫、农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经济特区的规划和建设等具体领域的知识和技能，以及诸如发展战略规划、产业政策设计、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等经济社会发展经验。在探讨属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议题时，应多从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构建的角度去共同

^① 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载《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日。

探讨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多从国家发展的角度去强调现代国家制度建设，多从人类文明共同繁荣的角度去培育共享的文化、观念和思想，而尽量不去争辩意识形态的高下之分和政治制度的孰优孰劣。中国自然应该借机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但出发点在于相互尊重与包容，着眼点在于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争取更多的国际尊重和理解。

第四，谦虚谨慎。稳步推进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治理经验交流，还需始终秉持谦虚谨慎的精神。一是要充分照顾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舒适度和接受度。我们要以一种谦虚谨慎的态度去描述和对外宣介中国发展成就、发展地位和治国理政经验，尽量避免引发或加重国际社会对中国战略意图的曲解和猜忌。二是要看到全球发展问题的复杂性和我们认识的相对有限性，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深入了解它们的历史、文化和制度，了解它们的发展条件、发展成就和面临的发展问题。仅以非洲大陆为例，非洲有54个国家，人文特点和发展程度的差异十分巨大，面临的发展问题也各不相同。浙江师范大学刘鸿武教授曾言，当我们走进非洲之时，非洲人是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先生”。^①的确，我们不要试图代替非洲人发现非洲，不要试图代替非洲人思考非洲，不要试图代替非洲人治理非洲。我们要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延续性和长期性有充分的认识，要对全球发展问题的复杂性和挑战性要有充分的敬畏之心。

我们还要看到，虽然很多发展中国家在不同场合都表达过对中国发展的羡慕，表达过对“中国模式”的兴趣，表达过分享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的愿望，但客观来讲，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对自身历史文化有一定程度的自信，对西方发展理念、制度和经验有相当程度的了解甚至不同程度的认同。我们可以乐见非洲国家“向东看”、拉美国家“向西看”，但期待非洲国家“向东走”或者拉美国家“向西走”，显然并不完全现实。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治国理政经验交流，自然有助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完善各自发展模式，丰富它们对治国理政的思考，但幻想用“中国模式”去取代“西方模式”，或者以中国经验去拯救其他发展中国家，无疑也是不现实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基于自身文化自信和利益需要，自然会自主探索自身发展道路和制度选择，自然会有选择性地借鉴外部世界的发展经验，我们对此要有正确的认识。

^① 刘鸿武教授在2017年中国智库论坛（北京）大会上做了题为《建立学科、智库、传媒三位一体发展格局》的演讲，强调“必须扎根非洲大地做学问”，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的“非洲学”学科体系。

Exchanges of Governance Experiences between China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History, Theory and World Significance

Luo Jianbo

Abstract: China's governance experience mainly refers to China's reform,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experience which has been gradually explored and accumulated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governance experience has four distinct connotations: self-reliance, developmentalism, effective government and plural consensus. With the general atten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China's develop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a's self-confidence, the exchange of experience, interaction of ideas and dialogue of governance between China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developing steadily, which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cus and growing point for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t present. This kind of experience exchange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people-to-people exchange in essence, and also has the significance of global development and global governance. Its in-depth development not only helps to promote the solution of global development problems, but also provides new inspiration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explore their own development path, promotes the diversification of global knowledge flow pattern through deepening South-South knowledge exchange and concept innovation, and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and perfection of the world order. Continuing to promote stable and far-reaching exchanges of experience in governance and administ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requires adherence to the principles of mutual equality, mutual learning, and reserving differences while seeking common ground.

Key Words: China's Diplomacy; Developing Countries; Governance Experience; South-South Cooperation; World Order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冯基华)